

主观臆测

笔记本： 读书笔记

创建时间： 2022/6/2 10:08

更新时间： 2022/6/2 10:20

作者： 176mapbr405

URL: <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523352379/edit>

主观臆测

关于为什么很多左派认为高华是在黑毛，实际上和他的语言描述方式分不开，我随便截取几段：

《论持久战》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，在这篇演讲中，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「怀疑」、「轻视」游击战的战略地位。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「机械论」的观点，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，被指责为是「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」。毛在演讲中，以不容置疑的口气，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道。

我来改写一下：

《论持久战》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，在这篇演讲中，毛泽东指出了部分同志在抗战初期怀疑、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的问题。毛泽东认为，周恩来过去关于批评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「机械论」的观点，表明周恩来并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。

再比如原文这一段：

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，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，他只是在与己不利的形势下，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。在私下里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起反击。

我来改写一下：

尽管毛泽东迫于局势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，但他这只是出于对大局的考量。在内心中，毛泽东其实并不认可王明的战略方针。

再比如原文：

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，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，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响力，但是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，毛泽东尚未能将他的势力延伸到中共领导机构的另一组成部分—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。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，因享有法理上和精

神上的巨大优势，在中共党内获有崇高的威望，毛泽东将不得不与从未谋面的王明合作共事。

我来改写一下：

遵义会议实质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的团体在中共军队中的领导权，极大的加强了毛泽东对中央机关的影响力。但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，依然在中共党内具有相当程度的法理性。因而此时的毛泽东，其实相当于在于王明合作共事。

再比如原文：

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，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，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。正当王明自鸣得意，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，毛泽东则在妥协、退却烟幕的掩护下，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、积蓄力量。

我来改写一下：

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实质上造成了王明与毛泽东在思想上的重要分歧。

再比如原文：

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，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。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，「挟天子以令诸侯」。毛更难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，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。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，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，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，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。

这一段比较抱歉，全是心理活动，我实在没法改写的。相信正常人读完这段和我的感觉差不多：他要么是毛本人，要么是毛肚子里的蛔虫。

诸位看官发现什么问题了吗？

是的，高老师在涉及到毛泽东行为的遣词造句、以及对于毛泽东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上，细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并且这种心里描写都倾向于将毛塑造造成一个狭隘、隐忍、贪权、记仇、内心戏十足的阴谋家——或者说枭雄。高老师在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和描写上有参考文献，但是这些心理活动有诸如蒋日记之类的参考文献吗？显然是没有。

如杨奎松所说：

我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，便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：我非常欣赏他对延安整风中党把中下层干部改造成“新人”的方法、路径及其经过的深入考察，但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，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动机、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“深描”，

有足够的实证依据。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。以后，围绕着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，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。

这应该代表了学界对于其在非史实内容上的一部分态度。

还有金冲及的评价：

我没看完《红太阳》，但我听说了这个书。有一次我和高华在山西聊了半天。我差不多比他长一辈。他父亲是厦大地下党，我是复旦地下党，他父亲被打成右派，这个对人看问题确实会有影响。延安整风，说实在，他看的材料太少。延安整风核心的会议记录，我是系统地看过的。他这些都看不到，只能拿公开发表过的材料来说。所以我觉得，有些东西他比较隔膜，靠猜。延安整风当然有些问题，特别是‘抢救运动’。后来毛泽东也说，我一直向你们敬礼，（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，你们不还礼，）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。但是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，系统的政治局的记录我都看过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会是怎么开的。照我看，这些会上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，反对主观主义。我和高华说过，我和他父亲一辈，他吃苦头我也吃苦头。吃过那么多苦头，我还是想把我们国家搞好……我是很温和，不极端的人。现在很多人尽讲国民党好的，尽说共产党不好，我感到不符合事实。

虽然这个问题一旦被指出来后大家看得就比较明显了，但不是专门做史学研究的话，极大概率是发现不了的，顶多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我倾向于高老师是由于个人经历，无意中使用了这种叙事方式，没有主观如此作为的意向——不过这样说明高老师在圈子里可能比较孤僻，所以没有人给他指出这个问题。

史料是客观的，但同样的史实，把人塑造成高大伟岸还是阴险狡诈却是主观的。即便是基于推理，也很难想象所谓依据各种公开资料能得出这么个人物形象的结论——正常公文不都是伟光正吗？

当然我个人是拿这本书当史料集来看的，有过文理兼修的科研经历，对于什么是废话什么是历史事件本身拎的比较清楚，能够摒除废话的影响直接提取历史事件本身。但大众读者其实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。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或者年龄大阅历多拥有自己判断力的人，基本都会被这种叙事方式影响。

不管在历史学的哪个研究领域，这种叙事方式，一般都要极力避免的。史料是客观的，但采取什么叙事方式，把人塑造成高大伟岸还是阴险狡诈却是主观的。但高老师的这个缺点导致我在读他的其它著作时，总要下意识的提防并不断问自己“是不是”，以免一不小心被带到沟里去。鉴于这种读书方式比较累，后来如果是有别的史料可参考的话，我基本都会放弃读他的作品。也有答主指出了高老师在学术研究上曾将野史引为参考文献的先例，大家也可以去看看。

高老师本人除了代表作之外还有不少作品，可以看出高老师在历史研究上是有其本人的见地与长处的。但由于其家庭受过牵连，因此对于毛，高老师始终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怨怼。这种受害者的怨怼心理导致其在认识、评价毛时，思维趋向于狭隘，不复一名史学家本身所应有的客观，甚至表现

为故意的丑化。尤其是其在言谈中不经意间表露出来的轻浮，将这种他对于毛和其它历史人物的区别对待表现的淋漓尽致。有类似问题的还有沈志华和袁某某，都受到自身经历造成的思想烙印影响。当然，高、沈得益于学术环境的影响，在认识上比袁要好不少。但在海外舆论场的影响，高老师比这两位大得多。

再回头看看金老爷子的评价：

他父亲被打成右派，这个对人看问题确实会有影响。金老爷子年龄大所以说话比较委婉，但对于历史学研究者来说，这实际上这是很严肃的一种批评。翻译过来其实就是：你不客观。

嫁接史料

2022.6.2更新：

今日也来了兴趣，挑一段有参考的内容去看了下原文：

1930年10月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，旋即退出，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。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，军中一时思想混乱。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，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，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「快速整军」——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、团、营、连、排成立肃反组织，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，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「AB团」分子，^①其中有「几十个总团长」（指AB团总团长），这些人都遭处决。

红一方面军内部的「打AB团」极为惨烈，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，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，人人自危，朝不保夕。

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，该师组织科长、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，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，参加过南昌暴动，随朱德上井冈山后，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。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、毛争论中，站在朱德一边，从此便不被毛重用，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，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。

^① 毛泽东：《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》（1930年12月20日），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：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》（北京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，1985年）：第14册，页634。

理所当然，前面的那什么“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，军中一时思想混乱。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……发动「快速整军」”，基本上全是脑洞，而且是无厘头的脑洞。为什么这么说，首先“农村包围城市”是1927年9月提出的，因此打下城市后退出，根本没什么不妥。其次

高老师认为毛为了“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”而发动“快速整军”，“捕杀……处决”。

我怎么觉得，这些行为根本起不到任何“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”的作用，反而会致使情绪更加不稳呢？稳定情绪不应该是让军队休整吗？在高老师的逻辑里，逮捕自己的同志并处决，可以“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”？这是什么鬼逻辑？

吐槽完了脑洞，我们来考察高老师参考文献的真实性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做，以前我默认其参考文献为真。而诡异的地方就在参考文献里。高老师标注的参考文献是：

毛泽东：〈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〉（1930年12月20日），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：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》（北京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，1985年）；第14册，页634。

嘿嘿，我还真找到了这份资料的原版影印版，1985年的原版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

首先，这份原版影印材料〈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〉，并没有在文末署名“毛泽东”！这封信中对毛的称呼是“毛泽东”和“毛同志”，是第三人称。正常人看这封信不会认为是毛泽东自己写的。

其次，从高老师的参考文献标注方式上来看，高老师是猜测这封信是毛伪装第三人称写的，并将这种猜测体现在了参考文献的标注上。这一点在之后的注释内容中得到了证实：

② 毛泽东在〈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〉中强调：「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，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，反对毛泽东」。

24

添加图片注释，不超过140字（可选）

最后，肃出“四千四百余人”，在〈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〉原文中有所体现，如下：

（一）到底是那一个陷害同志？AB团取消派现在反对毛泽东唯一的罪状，是陷害同志，造成什么“要把赣西南干部一网打尽”的谣言，企图恐吓动摇一班革命同志来反对毛同志个人，达到AB团取消派破坏革命的阴谋事实是现在的赣东行委，赣东苏维埃办事处，赣南东南行委，与团县委，县苏、万安县委，县苏，泰和县委县苏，吉安市苏，永南区委，永丰县委，县苏，沙溪田区委，区苏，凡了解富田事变的同志，一天一天都站在总前委正确路线之下，一致反对富田事变，毛同志又不做孤家寡人，为什么要把革命同志一网打尽呢？一个打尽的欺骗恐吓，事实已告失败，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，总司令，军事团长，五次定期暴动，制好了暴动旗，设不严厉扑灭，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，可是AB团取消派血口喷人，说屠杀了大批干部，不错，在你们AB团取

但是高老师这里的描述会让人出现误区：

牢骚不满分子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，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「AB团」分子，^①其中有「几十个总团长」（指AB团总团长），这些人都遭处决。

这里有两种理解，一种是四千四百余人遭处决，一种是几十个总团长遭受处决。那么事实如何呢？

事实上是，材料根本没有提到“几十个总团长.....遭受处决”，也没有提到“四千四百余人.....遭受处决”。高老师应该是根据“设不严厉扑灭”中的“严厉扑灭”，得出有“四千四百余人”或者“几十个总团长”都“遭受处决”的结论。

至于这里的“设不严厉扑灭”指的是扑灭暴动行为，还是扑灭被肃出的“四千四百余人”或“几十个总团长”的性命，那就见仁见智了，反正高老师是后一种理解。

因此高老师的原文以及参考文献标注方式给读者的直观理解是：

毛发表了〈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〉，在这封信中，有他为了“消除军中的不稳定信息”，发动“快速正整军”，处决“四千四百余人”或者“几十个总团长”的信息。

相信没看过〈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〉原文的人，得出的应该都是上面的结论。

再说说〈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〉的具体内容，有途径的可以自己去看看。不过鉴于有些人没途径，我说一下这封信的大体内容：其主旨是用来反驳当时认为毛是在搞阴谋论的论调的。

然后高老师根据这封反驳毛在搞阴谋论的信，得出了毛在搞阴谋的“史实”。

我们接着来继续看紧接着的下一段，两段是一起的，所以重发一下；

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，该师组织科长、政务科长都被当作 AB 团被肃掉，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，参加过南昌暴动，随朱德上井冈山后，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。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、毛争论中，站在朱德一边，从此便不被毛重用，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，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。

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，「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」。何笃才认为，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，请本事，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，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。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，「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，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，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。」何笃才并举例说，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，受到毛的重用，被赋予很大的权力，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。^①果其不然，这位聪颖过人、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「AB 团」的恶名遭到杀害。

添加图片注释，不超过 140 字（可选）

此处的参考文献为黄克诚的个人自述。这一段是最能忽悠人的，不过先提醒一下各位看官，黄的自述与李姓日记哥的回忆录，都出版于同一个时代。然后我们再来谈谈这里面有哪些问题。

首先，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时间线错误。此处紧接着上文的1930年10月，上记载“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”。而事实上，黄克诚此时根本不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！黄克诚担任此职务的时间在1931年1月后！这一点可以从黄的自述中及百科中查证。

其次，第二个致命错误，何笃才根本不是死于这一次肃XX团！而是死于1931年到1932年初的第二次肃返。这一点从《黄克诚传》中可以查证。

最后，在黄克诚的自述中，他说“我们第三师还是损失了一些干部。其中不少是很优秀的干部.....宣传科长何笃才。”因为描述为“我们第三师”，所以这段描述何笃才的时间线也是明确的在1931年1月之后——在第三师工作之前，黄在第五师工作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高老师为什么要嫁接时间线？因为1931年1月后，项英成为了江西苏区党、军队的最高领导人，肃返误杀的锅就甩不到毛身上了，毛泽东成为副主席。

后面的分析其实还有，不过高老师描写原文比较过火就不放了。回头有空更新到仓库里。